

写实主义的“问题剧”与“社会剧”^{*}

彭耀春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2)

摘 要 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写实的社会剧”。“问题剧”以易卜生写实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倡导“写实的社会剧”,使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

关键词 写实主义;问题剧;社会剧

中图分类号 J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3)03-0025-05

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正视现实的创作精神,一种客观地描写社会生活的创作方法,或者是一种忠实反映生活的文艺思潮。本文所描述的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流变,兼及三者,主要是指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质的文艺思潮,它基本上是在对外国文艺横向吸收和改造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新质的文艺观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显示:现实主义戏剧既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源头,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的主导流派。

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写实的社会剧。”

中国新戏的发端,就是以“为求新异,为求进步”为目的,而“竭力向模仿的写实的路上走”。中国现代戏剧最初编写和演出的,是由几个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的“写实的模仿人生的废除歌唱而全用对话的戏剧”^{[1] P.13}《茶花女》、《黑奴吁天录》。1916年周恩来刊载于南开中学《校风》上的《吾校新剧观》,最早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提出了“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周恩来指出“现代写实剧者……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因而写实主义“潮流”,是“大势所趋”;“不得不资为观鉴”。正是在“写实”观念的指导下,南开新剧团能在文明戏一派衰微,而新文化运动尚未兴起之际,卓然独立,推出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力作《新

村正》。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中说:“新鲜的至诚的写实主义”成为“五四”革命军的“三大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6期)之一。尽管不少新文学的先驱者对浪漫主义或新浪漫主义颇有好感,但他们都明确地强调以现实主义来适应思想革命的要求。胡适在他那篇著名的《易卜生主义》的文章里开宗明义地宣称:

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

《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勇壮的出阵既是借助挪威戏剧大师的作品作为进攻旧戏的援兵,同时也是为新文学,包括新戏鼓吹“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的“写实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期)。

在西方众多的戏剧家里,为什么新文学、新戏剧独尊易卜生呢?而且,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坛上,易卜生已经以他后期剧作(如《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建筑师》等)的象征手法和心理分析而备受现代派的推崇,而“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化界,新戏剧界仍在独崇易卜生的写实主义,特别看重易卜生中期那些“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的社会问题剧,这实在是“五四”时期的中国正需要易卜生式的揭示社会真相,反抗传统观念,反抗社会压迫的现实主义戏剧,是国情使

* 收稿日期 2003-05-21

作者简介 彭耀春(1954-)男,江苏南京人,江苏警官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万方数据

然,是时代选择了易卜生主义和现实主义戏剧。易卜生写实的社会问题剧的介绍如奇兵突发,不但动摇了旧戏在戏剧界的垄断地位,还为新文学新戏剧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和形式,那就是把戏剧当作“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1] p.20)},以“问题剧”的形式,写实地反映揭示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引起警觉和讨论。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与“五四”文坛上的“问题小说”同步,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易卜生的“问题剧”应运而生,在中国现代剧坛上形成一股“易卜生热”。第一部戏,则是胡适的《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发表于1919年3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这是最早运用现代话剧的形式表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剧作,因而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出独幕剧剧情简单:在半新半旧风气的田先生家庭,田太太请来算命瞎子为女儿田亚梅的婚事算命,被告男女生辰相克;“这门亲事是做不得的”。田亚梅几年前在东洋就和陈先生相识相恋了,她盼望得到父亲的支持。田先生一向反对田太太的迷信求卜,可他却捧出一部家谱告诉女儿:“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姓田的只是一家……所以两姓祠堂里都不准通婚。”就在田先生和田太太吃饭时,陈先生托佣人给田亚梅送来字条:“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田亚梅毅然留下一纸,披衣出门。纸条写道:“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上陈先生的汽车走了……”。《终身大事》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易卜生《娜拉》的仿制。胡适得风气之先,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和易卜生写实剧的浸染,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而成此剧。“五四”时期,婚姻问题是知识青年从切身经验中首先感到痛苦的和觉悟到应该解决的大事。所以,尽管《终身大事》有趣剧的色彩,主要是“半新半旧”的田先生田太太,就如田家“中西合璧式”的家俱陈设一样,观念上的不协调被剧作家用夸张的手法描绘成喜剧的矛盾,但剧本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是十分强烈的,年轻一代针对“中国风俗规矩”和“祖宗定下的祠规”喊出“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的呼声,振聋发聩,为时代之音,革命之声,洪深在称道《终身大事》时说:“这时期,理论非常丰富,创作却十分贫乏。只有胡适的《终身大事》一部剧本,是值得称道的。”“田亚梅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人物,而‘终身大事’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又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出反映生活的社会剧。”^{[1] p.23)}

《终身大事》开了仿制易卜生戏剧的先河,加之“五四”时代风气引导,中国初期话剧剧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娜拉”型人物和“出走”型的作品,如余上沅的《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成仿吾的《欢迎会》、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张闻天的《青春的梦》,甚至在浪漫主义戏剧《卓文君》和《获虎之夜》里也塑造了古代的娜拉和出走未成的女性。执着现实的精神贯穿在问题剧的创作中,易卜生的“出走”又直接为新剧作家提供了一种明了便利的戏剧模式。这类戏剧故事的情节框架大都以一组中年的人物代表旧社会,另一方面又以一对青年代表新思想,然后竭力暴露旧社会的丑态、对青年的压制,描写青年觉醒,于是双方冲突,青年反抗,最后则以新人物的出走来表现剧作家的社会理想。

欧阳予倩的《泼妇》描写做了银行副经理的陈慎之信奉“岂有不讨姨太太而能称新人物”,背着妻子从堂子里买来王氏做妾。《泼妇》将戏剧冲突集中在陈慎之纳妾进门之际,在不可避免的新旧观念的正面冲突中揭露受到传统陋习腐蚀而倒退的“新人物”,也塑造出具有民主思想、独立人格、敢做敢为的“五四”新女性于素心。陈家请来姑母和小姨劝说于素心,于素心怒斥陈慎之背弃誓言,揭发他所谓正义人道的假面,以把儿子带走为要挟,逼陈慎之退还王氏,写出离婚书,然后带王氏、儿子一同离去。众人面面相觑:“真好个泼妇啊!”《回家以后》更是一出视角独特,分寸感很强的社会问题剧。剧本描写陆治平在美国娶了刘玛利,回到家乡湖南欲与妻子吴自芳离婚,可回家以后又发现自芳有许多新式女子所没有的好处,欲言而不能。就在这时刘玛利闻讯追踪而至,激起这个乡绅之家的轩然大波,刘玛利言辞逼人,令陆治平“赶紧跟这个乡下的女子正式离婚”,陆父震惊,岳父要求陆治平“凭他的良心来处置这件事情”,吴自芳则自重大度,体贴贤惠,冷静对待。陆治平似有悔悟而又左右为难,只得“暂且”一去。剧作家在一片“婚姻自主”的声浪中提出接触西方文明的留学生应严肃对待爱情的主题,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见解。更值得注意的,是剧本着意设置“乡下的女子”吴自芳贤惠庄重与“洋女子”刘玛利泼辣强悍的对比,流露出对以知情达礼、温柔敦厚的东方女性的爱护赞美和对以田园耕读为内容的

传统文化的亲近留连,认为西方文明中也有“迷魂汤”。所以洪深极有见地地提醒人们:“这个戏,演得轻重稍有不合,也容易变成一个崇扬旧道德,讥骂留学生的浅薄的东西。”^{[1] p.70}在更深层次上,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正显示出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剧作家的一种心态,他在理智与情感,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求两者的融合而不能单向抉择,偏偏陆治平的婚姻又必须排他,剧作家就只得让陆治平不知所为而去,留给人猜测和思索。

以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为题材的戏剧是“五四”时期问题剧的热点,这些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戏剧,对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予以锐利打击。女作家石评梅更进一步从知识青年的恋爱婚姻受到封建家庭摧残的悲剧中提出了“这是谁的罪?”的问题,为“五四”问题剧抹上思辩的色彩。《这是谁的罪》是一部“受着眼前社会上活的事实反射而产生”的“今代的人情剧”,^{[2] p.401}留美学生王甫仁和陈冰华相爱并在回国前订下婚约,可王甫仁一回国就受到父亲的压力,被迫与别的女子成亲。陈冰华没想到爱人回国不到一礼拜就被环境所软化;在美国不是说中国社会恶俗害人吗?但万想不到这种切肤的痛苦我陈冰华身受了。“她在婚宴上毒死新娘,终得以与王甫仁成婚,在婚礼后的当晚,她给王甫仁留下绝命书,承认自己夺君前妻以顺从爱情的要求,又以自杀得良心的慰藉,以“情的自杀”对杀子女的父母为一点儿的惩戒!”^{[2] p.401}

“五四”时期的问题剧以易卜生为老师。以易卜生写实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但是中国剧作家有自己的思路,他们始终关心社会问题,总愿意开出药方,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归宿,甚至要彻底否定现存社会,如张闻天的《青春的梦》。其次,易卜生剧中人物往往体现出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即反抗多数的人最有力,是“任个人而排众数”。中国的问题剧,并不强调个人的孤独或有力,也不如此突出个人与众人的对抗。

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高扬“民众的”为人生的“真的新戏”的旗帜,强调戏剧在现代中国的作用,一是宣扬进步思想,推动社会前进;二是揭露社会病根,三是“正真无私”地反射出“一国人民程度”。因而提倡“写实的社会剧。”从“五四”“问题剧”到这时期的“写实的社会剧”,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了,从热衷于“问题”或

从“问题”来编排戏剧,发展为描写社会的现实,反映广阔的人生,自觉要做一面“正直无私的”镜子,去反射“一国人民程度”,戏剧家不再是专注于描写激荡着民主精神和青春朝气的青年一代的悲欢离合,而是描写芸芸众生,展示社会的色相。即使是《幽兰女士》这样刻画寄寓作者理想的年轻女性形象的剧作,所展示的生活面要比《终身大事》一类问题剧开阔得多,并更多地以写实的描写揭露代表社会腐朽势力的人物。

蒲伯英戏剧揭露与讽刺的焦点在上流社会的虚伪的“道”上,他在“人艺剧专”时期发表了六幕剧《道义之交》和四幕剧《阔人的孝道》。揭开“阔人”的“道义”和“孝道”的虚假面孔,显露出内里的种种自私丑恶,以及因名不符实自相矛盾所造成的滑稽可笑,带有喜剧性的讽刺。

陈大悲是从文明戏舞台走向戏剧创作的,又从批判文明戏起而倡导爱美剧,他在1920—1924年间,为解决爱美剧舞台的上演剧目写了《良心》、《英雄与美人》、《是人吗?》、《双解放》、《幽兰女士》、《说不出》、《王裁缝的双十节》、《爱国贼》、《平民的恩人》、《忠孝家庭》、《维持风化》、《父亲的儿子》、《虎去狼来》等十几部剧作,主要是暴露社会黑暗,攻击封建礼教的虚伪和罪恶。内容大多为革命党人的蜕变、伪君子的卑劣、官僚家庭的丑闻、军阀混战的灾难、妓院的陋习、所谓“忠孝节义”的虚伪和妇女的悲惨命运。在情节上往往是偷听隐私,相互争斗,枪杀自尽,良心发现等几个环节,以适应市民阶层的观剧心理和审美情趣,引起观众的惊奇、猜测、紧张和快意的情感,因而在当时曾有“通俗戏剧”之称。又因为“一致地用出奇的事实与曲折的情节来刺激观众”,而被洪深称为“空想的闹剧”。^{[1] p.4}其最有影响的戏剧是1920年发表于《晨报》的五幕剧《英雄与美人》,剧作家“为要打破国人对‘英雄’与‘美人’的痴梦”^[3]而描写一对蜕变的“英雄”和“美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张汉光和他的情人林雅琴。剧作曲折地,也入情入理地描述了人物情感的变化,透过爱情悲欢表象的则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可悲的蜕变。此剧曾风行一时,但其实质只是肤浅的社会批判加上曲折的情节与感官的趣味。陈大悲写得比较好的剧作是“爱美剧”时期的《幽兰女士》。幽兰,这位具有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便一面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一面毅然去裁缝店认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刘凤。最后

她向父亲揭穿假儿子的骗局被李氏枪杀,在临终时希望父亲“能够得到一种觉悟”。这出戏虽有文明戏的家庭戏的色彩,描写稳私和罪恶,以枪杀结局等,但毕竟在一团污泥中显出一线光明,这就是闪耀着“五四”时代精神的幽兰女士。在她身上,表现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道德,挣脱家庭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等民主平等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熊佛西早期戏剧集《青春的悲哀》也是问题剧的路子,到1924年燕大毕业走进社会以后,他的戏剧审美创造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阶级矛盾。剧作家将《当票》作为“汉口租界虐待华工的写真”^[4];将外人在租界之横行,中国贫民阶级的生活与痛苦,以及甘心做奴隶者的恶毒行为表露无余。《甲子第一天》又是以“二七”罢工中英勇牺牲的施洋烈士为原型,塑造出一位支持烟厂工人罢工而被军阀杀害的青年律师时伯英。《醉了》则被誉为是“短小精悍”的独幕剧^[5];表现方式是尖锐的^[6];情节虽然很简单,但它很有力地暴露人生的丑恶一面,使我们深深地感到社会经济的压迫之可怕。“三幕剧《一片爱国心》是熊佛西早期戏剧的代表作。这个戏通过一个家庭夫妻之间、母女之间的矛盾侧面,成功地塑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爱国青年。女主人公唐亚男是一位聪明、热情、深明大义的女学生,她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母亲秋子是日本籍妇女,对亚男视若掌上明珠,亚男平时也爱母亲,依从母亲。母亲要亚男穿日本和服,她依从了,母亲要亚男不参加抵制日货的辩论会,她也被迫同意了。因而亚男一方面敬佩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同学们误解的目光和责备,她把痛苦深埋在心底。然而当涉及到国家民族的利益时,她性格中炽热的爱国热情便如火如荼地迸发出来。第二幕,当她听说母亲让身为实业督办的哥哥唐少亭在一张出卖祖国矿山权誉的契约上签字时,不禁义愤填膺,痛斥其兄,当母亲抢过契约出门要送交日本公使馆时,她毫不犹豫地冲出门,不顾母亲的眼睛已被打碎的玻璃刺伤,夺回契约,撕得粉碎,掷入室中,大笑起来。唐亚男这一系列举动生动地表现了经过“五四”洗礼,在反帝浪潮激励下青年一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而这位女主角当然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的楷模。《一片爱国心》和后来的郑伯奇的《抗争》一样,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时代情绪,同时也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有条不紊的戏剧结构,通俗流畅的语言达到了艺术上的较

高成就,可称为是在我国现代话剧诞生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倾向和较高艺术质量的优秀多幕剧作。

从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剧作家们已不再如“五四”初期从问题出发编排故事,而是从生活出发,写出生活中自己感受强烈的那部分,由此来反射“一国人民之程度”,塑造人物,表现社会与时代。把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讲得最为清楚的是洪深。洪深1921年回国就立刻成为中国剧坛上的“黑旋风”,为中国戏剧带进一股活力。他回国后一直强调戏剧是“属于一个时代的”^[7];是这个时代隐隐的一个小影^[8];戏剧所搬演的,都是人事,戏剧的取材,就是人生。^{[4] p.158}他回国后编演的第一部戏剧的《赵阎王》借鉴了奥尼尔的《琼斯皇》,运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浓重而有层次地表现赵大作恶后内心极端矛盾,直至崩溃的复杂心理过程。全剧气氛紧张节奏强烈。尽管在舞台表演上有着浓厚的表现主义色彩,但剧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是现实主义的,洪深曾撰文说明《赵阎王》不是鼓吹“裁军”之类的“趋时的作品”,他的戏剧都是“经历人生,观察人生,受了人生的刺激,直接从人生里滚出来的。”^{[4] p.16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阎王》的人物复杂性,在过去,旧戏里人物常常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明戏中多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夸张性人物;“五四”问题剧的人物形象色调单纯对比鲜明,要么是代表旧势力的中老年年纪的腐败虚伪人物,要么是代表了新思想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男女。而《赵阎王》中主人公则显示了现实主义戏剧的深化,他是普通农民,被迫当兵,受欺受压,又沾染恶习,他做过坏事又良心未泯,有忏悔之意,他偷了营长克扣的军饷潜逃终被追兵击毙。如同赵大的好友在掩埋赵大时所说的:“你啊!你做好人心太坏,做坏人心太好,好人坏人,都做不到家”。这其实正是剧作家对生活的深入认识和在创作中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态度。赵大这样一个“好人坏人,都做不到家”的真实复杂的戏剧人物,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汪仲贤的《好儿子》也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成功之作。剧作“描写一个上海的‘经纪小百姓’底家庭生活,写得忠实极了,在这次是完全从现实的生活里搬取材料的”。剧作家在剧本的前言里明确地说出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好儿子》是按照“事实明了”和“意义浅显”这两

个原则创作的”，从生活实际出发，如实地描写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在上海做经纪人的陆慎卿因失业造成家庭经济困窘，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埋怨和陆慎卿本人在经济与压力的压力下铤而走险，贩卖假钞而被捕抄家。剧作以陆慎卿为中心构成了婆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主仆之间的一组组各不相同的又相互影响的家庭矛盾，陆慎卿在母亲与媳妇之间左右为难，母亲逼儿交钱与对儿媳妇的不信任，妻子和弟弟对陆慎卿的抱怨及相互争吵，都得到十分真切地展现。难怪剧作家说：“这个剧是描写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差不多寄居在上海的经纪小百姓，都有过这种生活的机会，所以凡在上海经过平民生活的人，看了大概都能有些感触吧？”^{[5] (p.122)}剧作家又从陆家“分利者多，生利者少”和“利己心太重，人人没有公共观念”想到“我们民族的弱点”，想到“中国穷极了”，“督军”“执政府的阔人”的搜括钱财与“好儿子的家庭有什么两样？”^{[5] (p.122)}因而“虽是叙述一个家庭，也可以把他当作一个现在的中华民国的缩影”，力图赋予这个家庭悲剧以中国社会的共性因素，去开掘人物命运的普遍意义。《好儿子》的现实主义创作得到了戏剧史家的一致肯定，张庚曾评析说：“虽然作者的结论并没有归结到社会制度的原因，而不免用小市民的观点看问题，但由于比较忠实地反映了生活，也就说是一个朴素的写实作品。它在语言，生活细节的描写

参考文献：

[1] 洪深.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M].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2] 石评梅. 与止水先生论拙著《这是谁的罪》的剧本[A]. 石评梅选集[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3] 陈大悲. 答谢明霄先生论《英雄与美人》[N]. 晨报副镌. 1921-10-20(4).
[4] 洪深. 属于一个时代的戏剧[A]. 洪深研究专集[C].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6.
[5] 好儿子·前言[A].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6] 沈雁冰. 文学家的新使命[N]. 文学周报. 1925-9-13(1).

The “ Problem Stage Play ” and “ Society Stage Play ” about Realism

PENG Yao-chun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Jiangsu Nanjing 21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May 4th Movement , the plays about realism can be divided into “ Problem Stage Play ” and “ Society Stage Play ”. The former displayed and analyzed the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through the view and form of Ibsen Henrik Johan 's realism plays. The populace theatres that set up in 1921 initiated the social plays about realism and broadened the field of art vision of realism plays.
Keywords realism ; problem stage play ; society stage play